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文学性”问题研究 ——以语言学转向为参照

A Study on Literariness:
Centering on the Linguistic Turn

李 龙 © 著

 人民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文学性”问题研究 ——以语言学转向为参照

李 龙 ◎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性”问题研究:以语言学转向为参照 / 李龙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01-009908-8

I. ①文… II. ①李…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7495 号

“文学性”问题研究

WENXUEXING WENTI YANJIU

李 龙 著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李 葳

封面设计:阳洪燕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65250042/65289539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208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9908-8

定 价:27.50 元

著作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董学文

文学理论不仅要研究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变规律,研究作家、作品、读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应当研究各种不同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而后者,同样是文学理论研究自觉意识的一种体现。不同的文论话语往往源自不同的生成语境和生成方式,具体地说,就是源自不同的文论“范式”。而不同的文论研究“范式”,就决定了不同的话语机制和话语方式。其间,通过“关键词”的探讨来找到一种研究范式话语机制的生成及其衍化发展,进而发现其中存在的疑难和问题,推进新的理论“范式”的诞生,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同思想史上的“语言学转向”有着深刻的联系。利用语言学的知识、方法和模式来研究文学理论,已经成为当下文论史上一个新的品种。甚或可以说,不了解现代语言学,就很难真正了解现代文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国内文学理论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比较稀薄的。

文学理论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那么它自身的规范性就是研究者需要注意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存在迷恋观念和形态变换的倾向,而对许多重要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则缺乏深入、完整、系统的认识。这一点,只要同文学理论发达国度的状况相比,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换言之,我们似应看到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和加强的不成熟的地方。

在当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性”是不少研究者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对该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基本内涵是什么,发生了哪些偏移,研究得却很不够。不仅不够,而且还有诸多理解上的混乱和模糊大量存在。

面对这种情况,李龙博士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紧紧抓住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性”这个关键词,将其准确地置入文学理论语言学转向的语境当中,相当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评述了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各个时期、各种理论流派对“文学性”问题的观念与理解;十分清晰、确切地展示和描绘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文学性”问题发展演化的思想脉络和理论历程;尤其独到、深入地表达和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长期以来处在复杂而混乱状态的“文学性”问题的新见解和新认识。同时,也将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在问题的断裂呈现了出来。通过这种呈现,他又考察了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机制,揭示出这一话语机制内部存在的颠覆性力量,使人们清晰地理解了今天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他的研究不仅厘清了“文学性”问题的本真面貌,也使我们对20世纪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文学性”问题研究——以语言学转向为参照》一书的内容和价值。

研究文学理论,最为可贵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深沉的“历史感”和清醒的“学科自觉”。我认为,这三者该书都做到了。

研究文学理论,最忌讳的是流于表面、重复别人,储备不足、断章取义,言不及义、轻率判断。我认为,这三者该书都避免了。

研究文学理论,我主张“小题大做”,撕开一个“口子”,切入进去,挖得深些,拓得宽些,从具体“问题”或“概念”入手,最后变成一个具有纵深意义和拓展意义的成果。我认为,这一点该书也做到了。

作者为了研究“文学性”问题,细读了大量西方原著,考察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并以“文学性—文本性—修辞性”作为学术发展阶段性的概括和主体论述的线索,进而,又对西方理论界有关“文学性”问题研究产生的局限和偏颇做了揭示与透析。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可取的。

我知道,这是作者的开山之作。我愿它成为作者前行路上一个新起点的标志。

是为序。

2010年12月12日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1
一、思想史视野中的语言学转向	1
二、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8
三、“文学性”问题和语言学转向	14
四、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22
第一章 语言的诗性功能·····	29
一、“文学性”问题的提出	32
二、词语的复活	47
三、从形式到结构	53
四、“文学性”问题的“问题性”	63
第二章 语言和结构·····	69
一、理解结构主义	70
二、文学性:文学的抽象结构形式	80
三、语言学的历险	85
四、作为体制的“文学性”	99
五、“文学性”问题:科学与非科学之间	103

第三章 话语和文本	110
一、活的语言:话语	112
二、文本就是生产过程	119
三、文本的快乐	127
四、“跨文本性”=“文学性”	138
五、“文本”理论的问题性	142
 第四章 修辞学转向	 147
一、文本的力量:散播和延异	150
二、什么是“解构”?	166
三、文学性:语言的修辞功能	173
 结 语	 185
 参考文献	 190
 后 记	 196

绪 论

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通过文学,语言的存在再次在西方文化的界线处

和她的中心地带闪烁。^①

——米歇尔·福柯

一、思想史视野中的语言学转向

现代西方思想史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语言学占据了人文学科之要津,“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认识论思考的出发点,因此不难在语言学中发现人类现实的一切符号学方面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②。作为一股重要的人文思潮,语言学转向带来这样的观念,亦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符号系统,尽管它们都有自己的个性,但都将以某种方式归结于语言或者语言问题,语言具有特殊的力量,与其说“人”是生活在世界之中,毋宁说生活在语言之中。语言给世界命名,赋予其意义,反之,“人”也运用语言认知自我、掌握世界。思考的疆域难以穿越语言的界限,而只能栖息其中。思想和语言的位置就此发生了置

①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9页。

② [法]保罗·利科主编,李幼蒸、徐奕春译:《哲学主要趋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1~372页。

换。所以,有学者这样评价语言之于思想的作用:“20 世纪是语言的世纪。在这个世纪,语言成了思想的先验条件,思想的中心,思想的关键环境,思想的惟一客体,思想的主体”^①。这说明,语言既是思想思考的主体,也成为思想思考的对象,语言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它既是思想表述的通道,反过来也需要得到必要的反思和认识。

确切而言,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覆盖的范围非常宽泛,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向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渗透,英美分析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都构成了它的不同表现形式。现代哲学从反思认识世界的方式而转向分析和反思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就是从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

分析哲学认为脱离经验根据的形而上学都是由一些毫无意义的假陈述所构成的,所以只要能对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分析,就可以清除形而上学。因此,对分析哲学来说,“哲学的任务就是阐明在科学、艺术、伦理学、宗教等等领域中形成的概念系统,根据概念知识借以表达的那种语言去阐明这些系统。于是语言的阐明就成为哲学的首要的,而且最终是惟一的任务”^②。在他们看来,传统哲学家试图穿过语言,寄希望于主体、意识,直接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对语言的分析既是哲学命题得到澄清的出路,也是清理传统最为可靠的途径。因而,根据语言哲学,批判地重建哲学史便成为分析哲学明确的理论追求。对分析哲学而言,既然语法表达的是公众性的东西,因此,“思想是在把握句子的语义性质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谈论思想的结构就是谈论句子部分相互的语义关系”^③。所以语义分析不必考虑其中的主观性,只需借鉴数学、逻辑学的方法去寻找语法的规则和结构即可。也即是说,不是分析现象,而是分析概念,也就是分析语词的应用。因此,分析哲学放弃思辨,不再寻求解释世界的普遍规律,而是转向语义命题的抽象分析,转向探讨传统哲学命

① [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著,闫素伟译:《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88 页。

② [法]保罗·利科主编,李幼蒸、徐奕春译:《哲学主要趋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390 页。

③ [英]迈克尔·达米特著,王路译:《分析哲学的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 页。

题的逻辑演绎的前提。维特根斯坦更是把语言活动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都被当作语言的约定,而概念的使用则纯粹是出于方便的目的。不难看出,分析哲学转变了传统哲学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式,使哲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语言的“游戏”,而哲学也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语言学。

现象学对分析哲学这种语言游戏的倾向有所拨正。现象学也赞同分析哲学的主张,认为对世界的认识无法穿越语言,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的重要媒介。但是,现象学不同意分析哲学那种对语言的技术分析,而是更注重语言的表达方式。人们常常在同一性的意义上使用符号和表述,可是它们之间并不一致。虽然每一种符号必然要对应某种东西,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个符号都有一个借助这个符号表述出来的意义,“意指并不是一种在指示意义上的符号存在……但表述也在孤寂的心灵生活中发挥着它们的意指作用,只是不再作为信号而已”^①。这也即是说,意指的含义不仅仅是指符号所指的意义,还包括复杂的人的意向性以及人的心灵的活动。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还提出了关于语言本质和普遍语法的概念,认为是它们决定了语言必不可少的意义形式。语言是思想的身体,思考语言的思想恰恰又被包裹在语言之中,在其进行成功的表达之后,语言使自己被忘却了。这就如梅洛-庞蒂所言:“正是语言把我们投向了语言意指的东西,它通过它的运作本身在我们眼前隐匿自身,它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够让自己被忘却,并在语词之外为我们提供进入作者思想本身的通道,我们因此在事后相信我们是与作者不用说话地、精神对精神地联系在一起。”^②虽然思维在思考,言语在说话,目光在审视,但是在两个相同的词语之间还有一个正在思考着、说话的人存在,因而,现象学就是要重返会说话的主体,回到“我”与“我”说的语言之间的联系,进而理解语言整体的象征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条件,理解记号和事物之间的整体关系。正因为如此,现象学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主体所说的话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在说话的时候,主体就是其他主体的“其他主体”。思想不能独立于语词而存在,世界只能是意义世界,我们之所以能够与意义建立联系,是因为“不管把词语和意识概念当作语言

①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②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杨大春译:《世界的散文》,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页。

的获得交给我们的意义转移可能是什么,我们总有一种直接的手段来理解词语所指称的东西,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体验,有我们之所是的这种意识的体验,正是基于这种体验,语言的所有意义才得以比较,正是这种体验才使语言能恰如其分地为我们表示某种东西”^①。这也就告诉我们,与其说是人与世界之建立了关系,毋宁说是人对世界的体验,使得人与语言之间建立了意义关系。

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都把语言看作是人与世界之间的重要媒介,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则将语言置于本体地位。在古希腊并没有“语言”一词,因而,希腊人将语言现象理解为话语。“话语”在希腊语中就是“逻各斯”(logos),“逻各斯”作为话语,其功能就是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进而揭示话题所及的存在者,亦即把存在者从其被遮蔽的状态中拿出来,“逻各斯”因而也就成为理性和真理。所以,哲学思考就是在“逻各斯”的逻辑中寻找话语形式和话语成分的基础。但是,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逻辑却是奠基于现成事物的存在论,并且还还为后世的语言科学从原则上提供尺度。如果反过来,使话语自身从原则上具有生存论环节的源始性和广度,那么就需要把语言科学移置到存在论上更源始的基础之上,将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所以,哲学研究要询问一般语言的存在方式。“但语言不只是、而且并非首先是对要传达的东西的声音表达和文字表达。语言并非只是把或明或暗如此这般的意思转运到词语和句子中去,不如说,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②。这即是说,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和声音,而是说只有语言才最贴近人的本质。人对存在的理解以人的有限性和必死性为背景(换言之,人的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只能经由语言才能实现。

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话语,话语是人的解释和命题的根据,因而话语从本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式的存在方式,此在的可理解性作为话语道出了自身。把话语道说出来就成为语言,任何一种话语都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话语,同时由于话语总是先从某种角度和限度说话,所以话语在传达某种东西的时候又道出自身。因而,话语包括了以下环节:话语的对象、话语之所云本身、传达和公布。这些环节植根于此在的存在建构的生存论环节,正是这些东西使

①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页。

②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得语言成为可能。海德格尔指出,话语对生存的生存论结构的组建作用只有通过听和沉默这些现象才会变得清晰。听对话语具有构成作用,此在在听的过程中进入一种本真的敞开状态,听是一种领会,领会同他人一道在世的存在,最终达到共在,所以海德格尔说:“唯有所领会者能聆听”^①。至于沉默则近于“大音希声”,漫无边际的清淡,听起来很有意思,其实掩盖了人们真正去要去领悟的东西,只能起到遮蔽的作用,距离本真的存在越来越远,甚至把已经有所领会和理解的东西又带入虚假的澄清境界和琐碎的不可理解之中。相反,在交谈中沉默的人可能会更为本真地形成领会,“真正的沉默只能存在于真实的话语中。为了沉默,此在必须有东西可说,也就是说,此在必须具有它本身的真正而丰富的展开状态可供使用。……缄默这种话语样式如此源始地把此在的可理解性分环勾连,可说真实的能听和透彻的共处都源始于它”^②。因而,语言构成了本体论的场所,是存在的家,话语活动中的传达和公布体现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被传达物的能力,被充实的语言就是正在显示的语言,进而成为存在。所以它是一种“类似前苏格拉底的关心基本问题的诗人和思想家的语言”^③。而诗的吟唱就是为了呼唤出语言的本质,使人能够真正地领悟和理解存在的意义。不难看出,如果说分析哲学是强调语言的逻辑分析的话,那么,存在主义则反思语言的人文特性,力图超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直接通过语言寻求人类的存在意义。二者之间一个倾向于科学分析,而另一个则倾向于人文主义。在存在主义这里,语言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自身,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占有语言而是人被语言占有,人的历史也因此从属于语言,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只能诉诸对语言的理解和阐释。这一理论有把“语言”神化的倾向,对此,哈贝马斯曾评价说:

语言学转向进一步把哲学研究放到了更加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上,并将它带出了意识理论的困境。但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种本体论

①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2页。

② 同上。

③ [法]保罗·利科主编,李幼蒸、徐奕春译:《哲学主要趋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0页。

的语言观,使语言阐释世界的功能相对独立于内在的学习过程,并把语言图景的变换神化为一种充满着诗意的原始事件。^①

哈贝马斯的这段分析说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虽然把哲学带出了意识哲学的困境,但是又把语言独立于人之外,通过语言把哲学诗化。或者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这是‘理论的浪漫主义’,诗意承担了重要的任务,要使陈旧、枯萎、僵化、灭绝了的语言重新恢复起来”^②。

与海德格尔的这种思想相似,加达默尔则认为,语言同工具和符号不同,它并不是意识同世界打交道的工具,工具的本性在于人对它的掌握和利用,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弃之不用,而语言则并不具备这种工具特性。“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认识我们自己。学着说话并不是指学着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去标明一个我们早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熟悉的世界;而只是指获得对世界本身的熟悉和了解,了解世界是如何同我们交往的”^③。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生活在包围着我们的语言世界里,我们早已居于语言之中,人们所说的话语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的世界,进入这种语言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中成长,在这一世界中成长就必然要受这一世界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思维和认识一开始就已经带有了偏见。因而有必要从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游戏的精神(包括轻松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成功的喜悦精神)使一次成功的对话进行下去。所以,语言是人类存在的真正媒介,意义的表述首先就是语言的展开。“语言并非只是一种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所适于使用的装备,相反,以语言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得以表现的是,人拥有世界。世界就是对于人而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对于其他生物而存在的世界,尽管它们也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对于人的这个此在却是通过语

①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 [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著,闫素伟译:《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7页。

③ [德]加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言表述的”^①。这也即是说,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一种工具,它还是人与世界之间的桥梁,在语言之中积淀的是人类的历史,正是通过语言,人才能够拥有世界,认知自我。

从整体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来看,“语言学转向”是自“认识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转向。所谓的“认识论转向”是针对“本体论哲学”的转向。“认识论转向”反对离开主体,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去谈论世界或超验的存在,它以思想的客观性为基础,进而研究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等矛盾关系。而“语言学转向”则进一步反思并批判“认识论转向”,认为在建立关于人类主体意识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之前,必须有关于语言的理论,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决定性条件。换言之,没有经过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都不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世界在人之外,却在语言之中,人对世界的理解,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实现,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疆域,也是人类存在的界限。对于这一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解释:“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②。这种转向在哈贝马斯那里则被称为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

语言符号先前一直被认为是精神表现的工具和附件,然而,符号意义的中间领域现在展现了其特有的尊严。语言与世界以及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取代了主客体关系。建构世界的重任从先验主体性头上转移到语法结构身上。语言学家的重建工作代替了难以检验的反思。^③

这也即是说,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与其说是世界自身,毋宁说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世界,与此同时,所谓的主体,也是语言建构的结果。因此,不是主体,而是语言成为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对象。这种理解适用于概括语言学理论向各个人文学科的弥漫现象,但确切地讲,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并不关心实际

①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页。

② [美]汉斯·D. 斯鲁格著,江怡译:《弗雷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③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的语言问题,也不关心语言学家探讨的语言学理论,虽然它在文学理论领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和解释学文论的产生,而且后结构主义思想的产生同现象学、存在主义也有着深厚的联系。但是,若论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或流派能够超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

二、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有学者这样评述索绪尔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尽管索绪尔不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那样闻名于世,但就其对20世纪思想体系发展的影响来看,已足可以和他们相比肩。”^①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关于“语言/言语”的划分。传统语言学以“言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它只注重语言中个别要素的演变,既不能构成系统研究,也缺少科学性,在这些研究中,缺乏对研究本身意义的理解,语言并没有成为一个有机体。索绪尔对此表示了质疑,他认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一种已经构成的语言的正常的、有规律的生命”^②。所以,他主张根据共时性原则,确立语言作为共时系统的基本原则和语言状态的构成要素,因而,索绪尔把人类的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部分,并对两者的区别作了严格的界定。“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它本身并不表现出来,它作为一套符号和规则、作为词汇和语法体系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是语言活动的社会性部分,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表达观念的媒介和规范体系;“言语”则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是个体在具体日常情境中进行的话语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在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的支配。前者是一套对言语活动的社会性的普遍规约,“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

① *Modern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third edition, ed. Philip Rice and Patricia Waugh, Arnold, a member of Hodder Headline Group, 1996, p. 6.

②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8页。

成员中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①;后者则是个人对这套规约的具体运用,“同时跨着物理、生物和心理几个领域”^②,不构成单一学科的对象,因此,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前者,相对而言,“言语”的研究则是次要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自身内在的丰富性使其具有很大的可理解性和可阐释性的空间。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从他这里汲取了不同的思想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

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历时性”和“共时性”以及“组合”和“聚合”等概念,使传统的关于词与物、语言和思想、文字和语言等关系的认识被重新审视。首先,关于“语言/言语”结构的划分,构成了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框架。它使人们意识到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层次,谈论客体的“客体语言”和谈论语言自身的“元语言”。元语言是对语言自身的理解,它不仅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必要的科学工具,还构成了日常语言交流活动的潜在规范。这其实已经是一种结构主义的雏形。尤其是当列维-斯特劳斯将其应用到人类学的研究时,就将西方思想史推进到了结构主义时代。根据这一模式,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意识”的关系,社会结构和个体的关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甚至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都可以运用这种模式进行解释。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人们能够将文学理论置于“语言”(或者说“元语言”)的位置,而将具体的文学研究置于“言语”(或者说“客体语言”)的地位,这对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学科体制的迅速确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关系使人们认识到,“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天然的或者必然的,同时,它们的生成也不是必然的,“能指”是对声音的任意切分,“所指”则是对概念的任意切分。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符号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由“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两方面构成,“能指”是表示意义的形式,“所指”是被表示的意义。语言不仅可以任

①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意选择“能指”，也可以自由选择“所指”。“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①。索绪尔强调符号的任意性，打破了存在着一种天然语言的神话。这就如詹姆逊所说：“且不说别的，它首先明确地否定了最古老的语言理论，也就是诗人偶尔还让它起死回生一阵子的理论，即词与物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等于说应该把语言理解为名称和命名。但一旦语言绝对的任意性这一点弄清楚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这种内在联系的问题了”^②。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能指”和“所指”之间，尽管索绪尔强调二者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但事实上，他更侧重于“能指”而非“所指”。这种不平等关系使他的语言学理论既拒绝了外在的指涉物，也拒绝了历史和意义，而将语言视为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

第三，赋予语言系统独立性和自足性。每种语言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看法、组织概念，语言不是简单地给现存的各个范畴命名，而是通过语言重新归纳世界。这里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成为一套符号系统。通过“组合”与“聚合”、“历时”与“共时”的区分，索绪尔把语言构建成了一套结构森严的系统，并认为，在系统中单个符号并无意义，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意义的生成只能决定于它在系统中的位置，只能决定于语言要素之间的关系。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不必触动意义或声音，一个要素的价值可以只因为另一个相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而改变”^③。换言之，语言中的每一个成分之所以存在并且具有其独立的特性，是因为在整个语言系统中同其他成分的差异而存在的。在语言系统中，重要的不是言语、书写符号、声音形象及词义本身，而是它们之间在语言体系中的相互关系。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从本质上看，都是由它所归属的那个系统所决定的。这就使得能指独立出来，不再具有任何现实的指涉意义，由语言符号组成的话语系统也就同样不再具有任何指涉意义，“话语仍具

①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

②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钱佼汝译：《语言的牢笼》，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

③ [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7页。